

沙特政教关系变革与社会话语重构^{*}

孙晓雯 余纲正

[内容摘要] 长期以来,沙特阿拉伯奉瓦哈比派教义为国教,在政治领域和公共生活中践行瓦哈比派传统及其价值观。为实现经济多元化并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萨勒曼父子在掌权后推出了“2030 愿景”改革战略。推进这一目标既需要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又需要打造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包容的社会氛围,因而也就与瓦哈比派保守、排他的教条传统相悖。由此,以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为核心推手,沙特开始自上而下推动政教关系的变革,并尝试塑造新的社会话语:一方面,利用“温和伊斯兰”概念消解传统的保守宗教理念在国家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并通过倡导各宗教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展现一种平等、多元的姿态;另一方面,建构“国族”观念来强调服从国王和王储、热爱国家,试图以“国族”而非宗教为纽带将沙特各方力量以王权为核心黏合为一体。通过分析沙特政教关系改革的具体举措、“温和伊斯兰”和“国族主义”话语建构的内涵、动力和制约因素,本文发现沙特近年来的政教关系调整与社会话语重构既服务和助推了其国内政治与经济改革,也为其尝试缓和与稳定地区局势的外交行动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这些成果是否可以长期延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努力能否真正成为沙特国家制度的一部分。

[关键词] 沙特阿拉伯 中东政治 政教关系 国族主义 温和伊斯兰

[作者简介] 孙晓雯,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哲学院讲师;余纲正,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海外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1XNF051)的阶段性成果。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后,伊斯兰主义在中东地区曾一度呈现勃兴之势。然而随着穆兄会的分崩离析、“伊斯兰国”的败退以及伊斯兰主义力量在一些国家政治舞台的失利,以宗教为旗号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对中东各国内政外交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不少国家出现了世俗化程度加强的明显趋势。

沙特阿拉伯近年来所进行的政教关系改革和社会话语的构建尤为引人注目。自 2003 年遭受恐袭之后,沙特政府曾开始尝试推动“民族对话”和温和化改革,但很快遭遇挫折陷入停顿。2015 年,萨勒曼父子的上台为重启政教关系的改革进程带来了新的契机。2017 年 10 月 24 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利雅得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会上表示,要摧毁“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重返“温和中正的伊斯兰”。通过对宗教机构的人事任免和职能调整、镇压民间宗教反对派等一系列措施和手段,穆罕默德王储试图以“温和伊斯兰”概念弱化保守宗教话语对沙特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影响,同时建构“国族主义”来部分取代瓦哈比主义在政权合法性与社会凝聚力上所占据的传统地位。穆罕默德王储自上而下推动的社会话语重构,其核心目的在于巩固王权,配合国内的经济多元化改革措施,并为其在地区和全球的对外战略提供社会基础。对沙特当前政教关系和社会话语的关注,有助于理解沙特发展转型的总体路线以及内政外交的具体政策,更好地把握沙特乃至中东地区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沙特的社会变革和国家转型已进行不少讨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视角:第一,对沙特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层面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①第二,对某一领域的重点关注,尤其是对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层面。其中,对沙特政教关系与社会话语层面的探讨也有部分成果,但较少能将

^① 崔守军、杜普《沙特阿拉伯国家转型探析》,《世界政治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104~121 页;金良祥:《沙特国内变革全面推进》,《现代国际关系》2018 年第 3 期,第 35~40 页;马晓霖《“萨勒曼新政”与沙特内政外交走向》,《西亚非洲》2018 年第 2 期,第 3~30 页;陈沫《沙特阿拉伯“新政”与中沙合作前景》,《当代世界》2019 年第 8 期,第 55~61 页;刘中民、刘雪洁,《萨勒曼执政以来沙特的国家转型及其困境》,《西亚非洲》2020 年第 5 期,第 59~81 页;Madawi Al-Rasheed, ed., *Salman's Legacy: The Dilemmas of a New Era in Saudi Arabia*,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8.

改革举措与社会话语的建构和影响全面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地分析。^① 基于既往的研究成果和大量阿拉伯语原始资料,本文以改革为主线,剖析“温和伊斯兰”和“国族主义”的话语内涵、建构动机及其与沙特政教关系变革具体举措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指出其面临的前景与挑战,以期为理解沙特当前国内社会以及对外行为变化的理念与思想基础提供必要线索。

一、改革背景:沙特官方与民间政教格局的形成

自18世纪第一沙特王国建立后,沙特的国家统治就是建立在政治与宗教联盟的基础之上。其中,以沙特家族为核心的政治权力为瓦哈比派教义的传播提供庇护,而以谢赫家族为核心的宗教权威则为沙特家族的统治赋予宗教合法性。瓦哈比派宗教学者在沙特的公共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律法层面独尊罕百里教法学派并以“劝善戒恶”等宗教原则规范社会行为,以此维护沙特社会的共识、秩序和统一。

然而,王权与教权的立场并不永远保持一致。尤其是在第三沙特王国成立以来,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力长期进行着博弈与再平衡。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沙特政教格局演变历程中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深孚众望的费萨尔国王试图使传统让路于现代化进程,使宗教权威完全置于王权的掌控之中。1969年大穆夫提穆罕穆德·本·易卜拉欣逝世后,国王取消了大穆夫提的职位,并相继组建司法部、高级司法委员会、高级乌莱玛委员会等官方宗教机构,将大穆夫提的

^① 王霖懿、陈琪《沙特王室政治与对外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9期,第44~49页;陈杰《萨勒曼执政以来沙特的外交政策:志向、政策与手段》,《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1期,第62~82页;丁隆《萨勒曼继任以来沙特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前景》,《当代世界》2020年第2期,第11~19页;Stella Athanasoulia, "From 'Soft' to 'Hard' to 'Moderate': Islam in the Dilemmas of Post-2011 Saudi Foreign Policy," *Religions*, Vol. 11, No. 4, 2020, pp. 1~19; Eman Alhusein, "Saudi Arabia Champions 'Moderate Islam', Underpinning Reform Efforts," <https://agsiw.org/saudi-arabia-champions-moderate-islam-underpinning-reform-efforts/>; Madawi Al-Rasheed, *The Son King: Reform and Repression in Saudi Arab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Yasmine Farouk and Nathan J. Brown, "Saudi Arabia's Religious Reforms are Touching Nothing but Everything," in Frederic Wehrey, ed., *Islamic Institutions in Arab States: Mapping the Dynamics of Control, Co-optation, and Contention*,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21, pp. 7~32; Kristin Smith Diwan, "Saudi Arabia's New Nationalist Foreign Policy," <https://agsiw.org/saudi-arabias-new-nationalist-foreign-policy/>.

宗教权力分散入国家行政体系之中。官方宗教权威的体制化使其独立性大大削弱。但另一方面,1979年的麦加大清真寺劫持人质事件和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使得沙特国家的伊斯兰合法性受到严重威胁,沙特王室试图通过对宗教领域加强控制,并在社会上推行更严格保守的宗教氛围来证明自身的宗教正统性。在此基础上,沙特王室为宗教领域配置了更多资源,如提高官方宗教学者的待遇,大量修建清真寺,以及增加对国内外宣教活动的资金投入。如此一来导致的结果是既削弱了官方机构的宗教权威,又强化了整个社会的宗教氛围。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以“伊斯兰觉醒运动”(以下简称“觉醒运动”)为代表的民间宗教政治力量迅速壮大。此后沙特的宗教力量可以被视为由官方宗教机构和民间宗教力量共同构成,而二者与王权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①

20世纪90年代是沙特政教关系演变的另一重要节点。这一时期受海湾危机的影响,石油价格突然暴涨又急速下跌。沙特国内经济出现紧缩,就业机会减少。受传统教育但却无法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群众阶层与受西方教育把控国家资源的世俗主义精英阶层之间矛盾升级。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沙特国王邀请美军进驻阿拉伯半岛的行为成为了激化沙特社会不满情绪的导火索。在此次事件中,尽管许多官方宗教学者其实并不认同国王向“异教徒”寻求军事援助的决策,但在王室的极力劝说下,官方宗教机构最终还是决定向王室提供支持,由高级乌莱玛委员会出面发布了宗教法令为国王的决策赋予法理解释。以此事件为标志,官方宗教机构已由瓦哈比主义的守护者完全转变为王权的服务者,官方宗教机构的权威被进一步削弱。^②

与此同时,以“觉醒运动”为代表的民间宗教力量的影响力得以迅速提升。其中,萨法尔·哈瓦里、萨勒曼·奥达、纳赛尔·欧迈尔被认为是该运动的标志性人物,运用反世俗化、反西方的话语对沙特的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大胆批判。他

^① 沙特的官方宗教机构一部分负责教法咨议和提供宗教指导,如高级乌莱玛委员会和伊斯兰事务部。另一部分则为宗教原则的执行部门,如司法部、教育部和劝善戒恶委员会。此外,一些国际伊斯兰组织,如伊斯兰世界联盟、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等,亦发挥着对外传播沙特宗教意识形态的功能。

^② Guido Steinberg, "The Wahhabi Ulama and the Saudi State: 1745 to the Present," in Paul Aarts and Gerd Nonneman, eds.,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Political Economy,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5, p. 30.

们动员数百名宗教学者和知识分子,在1991年至1992年先后两次发起联名请愿活动,敦促沙特政府实施伊斯兰框架的改革,扩大宗教学者的参政议政权。这种政治异见为沙特政府所不容,大批“觉醒运动”成员被逮捕入狱,双方曾经一度友好的合作关系破裂。沙特政府也开始将“觉醒运动”以及与其具有密切联系的穆斯林兄弟会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因素。^①

不过,“觉醒运动”在特定条件下仍有服务于王室的价值。例如在2003年,沙特国内屡遭恐怖袭击,面对境内的极端主义浪潮,沙特政府采取了多重措施,其中包括发动“觉醒运动”的宗教学者协助对抗极端思想的传播。2003年5月利雅得爆炸案后,萨法尔·哈瓦里、萨勒曼·奥达以及其他的“觉醒运动”学者多次联合发表声明谴责恐怖袭击的暴力行为,号召年轻人不要“误入歧途”。^②此外,随着伊拉克战争、2006年黎以冲突以及所谓“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变局等事件接连发生,教派主义成为沙特遏制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等什叶派政治力量的有效话语工具。在此期间,“觉醒运动”和官方机构的宗教学者纷纷发布了大量反什叶派、反伊朗的宗教法令、演讲和网络文章,对沙特政府将教派主义话语安全化和工具化的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③正是由于沙特政府的利用和默许,同时得益于新兴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觉醒运动”中部分宗教学者的声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他们在沙特民间,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以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谢赫为首的官方宗教学者。例如,萨勒曼·奥达的推特账号拥有上千万的关注者,是沙特拥有最多关注者的宗教人士之一。他曾开设了自己的网站“今日伊斯兰”,并频繁现身各种电视节目。

值得一提的是,新兴社交媒体同样助推了沙特境内“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快速发展。该运动将自由、平等、公正、人权等现代价值观与伊斯兰主义话语结合起来,号召实施“伊斯兰民主化”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其代表组织包括沙特首个非政府人权组织“沙特公民与政治权利协会”以及首个政党“伊斯兰

① 孙晓雯《瓦哈比主义与当代主要伊斯兰思潮关系探析》,《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2期,第118页。

② Madawi Al-Rasheed, *Contesting the Saudi State: Islamic Voices from a New Gen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83.

③ 孙晓雯《沙特政教关系与教派主义话语的构建》,《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1期,第126页。

乌玛党”。^① 2009 年之前,沙特政府并未对该运动予以重视,但其对于政体传统的潜在威胁性很快展现出来。一方面,这些“伊斯兰-自由主义”者由于善于运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其观点主张,吸引越来越多 20 至 30 岁、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加入其中。^② 另一方面,该运动表现出很强的跨教派政治动员能力,联合了沙特境内的多个政治不同意见力量,包括部分“觉醒运动”活动者、自由派、左翼,甚至是什叶派,这样一个跨教派反对者联盟是沙特政府绝不想看到的景象。因此,在应对中东变局给沙特带来的社会冲击和动荡时,沙特政府也不得不再次使用教派主义话语工具,试图分化国内的反对力量。^③

可见在 2015 年之前,沙特的政治与宗教领域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张力。一方面,长期以来沙特社会积压的腐败、高失业率、政府部门效率低下等问题令日渐庞大的青年人口心怀不满,而沙特浓厚的宗教氛围和拒斥任何形式的政党组织的特定环境,使得这种不满往往只能借用宗教话语的形式来表达,这导致宗教与政治间的界限模糊。另一方面,高涨的教派冲突思维加剧了地区局势的动荡,带来了国内社会的割裂。2014 年至 2015 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沙特境内多次发动针对什叶派平民的袭击,威胁了沙特的国家安全。同时,教派主义更是在年轻人中导致了身份认同的危机,部分人甚至转向传统左翼的泛阿拉伯主义中去寻求精神庇护。^④ 因此,在 2015 年萨勒曼父子掌权后,如何变革政教关系使之继续服务于王权,同时如何发展出一个凝聚社会力量的国家身份认同,成为其治理社会和巩固权力所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① 吴彦《沙特阿拉伯“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初探》,《西亚非洲》2011 年第 4 期,第 32 页。

② Stéphane Lacroix, “Saudi Islamists and the Arab Spring,” Research Paper, Kuwait Programme on Development, Governance and Globalisation in the Gulf States, 2014, p. 7.

③ Madawi Al-Rasheed, “Sectarianism as Counter-Revolution: Saudi Responses to Arab Spring,”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11, No. 3, 2011, pp. 520 ~ 523.

④ Eman Alhusein, “Saudi Arabia Champions ‘Moderate Islam’, Underpinning Reform Efforts,” p. 5, https://agsiw.org/wp-content/uploads/2020/12/Alhusein_Saudi-Moderate-Islam_ONLINE.pdf.

二、萨勒曼父子的政教关系变革

2015年萨勒曼父子执掌大权后,政教关系成为其一系列改革举措中的重点领域。2017年,穆罕默德王储在未来投资倡议会中宣布“我们正在回到以前的状态——一个温和中正的伊斯兰国家,向全球所有的宗教、传统和人民开放。”^①“温和伊斯兰”概念甫一提出,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在具体的政教关系变革措施上,以“温和伊斯兰”为旗号的改革并不直接否定瓦哈比主义,而是通过具体行政手段和调整措施逐步塑造宗教规范,其目的是清除宗教领域中对王权构成挑战的部分,使其能够完全为穆罕默德王储的政治雄心和改革计划服务。

对于官方宗教学者,萨勒曼父子采取了“限制与利用”双管齐下的策略。长期以来,瓦哈比派官方宗教学者较少直接或公开地谴责执政者。一方面他们秉持传统的逊尼派政治观,即“遵从主事人”的原则,将服从统治者、维护伊斯兰社团的统一视为最高的宗教原则。另一方面,由于官方宗教学者对王室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附,任何对王室政策的反对都有可能使其丧失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特权和优先地位。不过随着改革的进行,官方宗教学者群体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萨勒曼父子尽量不与官方宗教学者断然决裂,从而避免失去后者的集体支持。因此,尽管在改革政策上面临某些保守派官方宗教学者的谴责或批判,萨勒曼父子在总体上采取“限制”的手段。沙特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谢赫曾公开反对创建娱乐管理总局、引进电影和音乐会等新政策,高级乌莱玛萨利赫·鲁海丹也曾强烈反对解除女性开车禁令。^②但穆罕默德王储并未像对待其他反对者那样予以逮捕和关押,而是主要通过查封社交账号,或禁止其在电视节目上公开露面来避免批判性言论的传播。在大部分情况下,即使认为王室的改革政策违背瓦哈比派教义,官方宗教学者在公开场合中

^① Riyād ta'ūd ilā al-islām al-wasafī, ” <https://www.al-watan.com/article/103310/news>.

^② David B. Ottoway, “Will Saudi Arabia’s Social Revolution Provoke a Wahhabi Backlash,”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will-saudi-arabias-social-revolution-provoke-wahhabi-backlash>.

通常会主动或被动地保持沉默,选择在私下提供建议。

仅仅是官方宗教学者的不公开反对是不够的,穆罕默德王储仍需要一些支持者能够积极配合他的改革政策。在此背景下,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凯里姆·伊萨(以下简称“穆罕默德·本·伊萨”)和沙特总检察长萨乌德·穆吉卜被任命为高级乌莱玛。穆罕默德·本·伊萨出生于1965年,被认为是官方宗教学者中的“少壮派”。他于2016年被任命为高级乌莱玛和伊斯兰世界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王储希望通过他来打造一个具有宗教温和性的积极正面的沙特形象。穆罕默德·本·伊萨主要致力于在海外传播沙特阿拉伯的温和伊斯兰话语,因此他突破“常规”的一些举动曾招致许多争议,其中尤以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友好”态度为最。他曾多次访问美国、巴黎、波兰等国的犹太会堂,并表示对犹太人遭受屠杀的同情和对纳粹德国的谴责。^①除了对犹太人的温和立场,穆罕默德·本·伊萨也对基督教展示更加开放的胸怀,如他在2018年12月会见了埃及科普特主教艾瓦·莫科斯,该主教在沙特公开举行了历史上的首次弥撒仪式。^②这些举措颠覆了瓦哈比派所常常强调的“忠诚与弃绝”不与异教徒往来的宗教传统。

同样,因帮助推动“温和伊斯兰”而被委以重任的是伊斯兰事务大臣阿卜杜·拉提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谢赫。他在阿卜杜拉国王执政时期,曾担任劝善戒恶委员会主席,以温和宽容的宗教立场著称,包括鼓励女性就业,以及支持特定条件下的性别混合。^③2018年,阿卜杜·拉提夫任职伊斯兰事务大臣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对抗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包括将宣教的权利限制于沙特籍全职伊玛目,对聚礼日的讲演进行更严格的监控。另一方面,在对外宣传工作中,伊斯兰事务部致力于为沙特的伊斯兰合法性辩护,将反对瓦哈比派教义等于反对认主独一,对沙特阿拉伯的侵犯等同于侵犯伊斯兰教,从而使瓦哈比主

① “Muslim World League Chief Leads Delegation to Auschwitz for Holocaust Memorial,” <https://www.arab-news.com/node/1617381/world>.

② “First Christian mass held in Saudi Arabia,” <https://theArabweekly.com/first-christian-mass-held-saudi-arabia>.

③ “Asharq Al-Awsat Profile: Sheikh Abdullatif Al-Sheikh, Asharq Al-Awsat,” <https://eng-archive.aawsat.com/theaawsat/features/profiles/asharq-al-awsat-profile-sheikh-abdullatif-al-sheikh>.

义避免被冠以“极端主义”之名。^①

除了重用以穆罕默德·本·伊萨和阿卜杜·拉提夫为代表的“改革派”宗教学者,一些服从王权的“保守派”学者也被委以要职,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萨乌德·穆吉卜。萨乌德·穆吉卜生于1966年,具有一定的教法研究背景,曾任职沙特最高司法委员会委员。2017年6月,他被萨勒曼国王任命为总检察长。此时总检察长办公室取代了原本隶属于沙特内政部的调查与起诉署的职能,直接向国王负责。^②萨乌德·穆吉卜被认为“顺从”萨勒曼父子,在2017年的沙特反腐运动、2018年的卡舒吉案,以及对“觉醒运动”长老萨勒曼·奥达的死刑判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将他任命为高级乌莱玛表明萨勒曼父子对高级乌莱玛委员会的进一步掌控。此外,一些在阿卜杜拉国王时期受到打压的保守派官方宗教学者被萨勒曼国王重新启用,如萨利赫·鲁海丹和萨阿德·舍希里。这些官方宗教学者通常背靠根深蒂固的宗教家族,且拥有深厚的宗教资源和广大的追随者。^④

通过这些举措,萨勒曼父子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得到了所需的官方宗教法理支持。例如在解除女性开车禁令的问题上,尽管有部分宗教学者反对,但该政策仍因获得了高级乌莱玛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投票支持而得以实施。^⑤在对抗穆兄会的问题上,高级乌莱玛委员会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对沙特政府的支持,谴

① Yasmine Farouk and Nathan J. Brown, “Saudi Arabia’s Religious Reforms are Touching Nothing but Everything,” in Frederic Wehrey ed., *Islamic Institutions in Arab States: Mapping the Dynamics of Control, Co-option, and Content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21, p. 14.

② Abdullah Al-Aoudh, “Saudi Arabia’s Convenient Attorney General,”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sada/75658>.

③ “Mādhā ya-nī tajdīd hay’ ah kibūr al-ulamā’ fi al-su-ūdiyāh’” <https://reurl.cc/nL4371>.

④ 例如,萨阿德·舍希里的父亲纳西尔·舍希里在哈利德国王、法赫德国王和阿卜杜拉国王执政期间曾担任国王顾问和内阁成员。萨阿德·舍希里本人曾师从沙特大穆夫提伊本·巴兹和阿卜杜勒·阿齐兹·谢赫,2009年他因批判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有违性别隔离原则而被解除高级乌莱玛职务,萨勒曼国王上台后恢复了其职务。萨利赫·鲁海丹是沙特大穆夫提伊本·易卜拉欣的弟子和女婿,自1971年起就担任高级乌莱玛职务,是最资深的高级乌莱玛之一。Nabil Mouline, *The Clerics of Islam: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Saudi Arab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98~199.

⑤ Stella Athanasoulia, “From ‘Soft’ to ‘Hard’ to ‘Moderate’: Islam in the Dilemmas of Post-2011 Saudi Foreign Policy,” *Religions*, Vol. 11, No. 4, 2020, p. 11.

责穆兄会不能代表真正的伊斯兰。^①

对于民间的宗教政治不同意见者,穆罕默德王储则更多地采取了“零容忍”的铁腕镇压政策。2017年6月,卡塔尔断交危机爆发后,多位“觉醒运动”宗教学者被逮捕入狱,其被指控的罪名是涉嫌与“恐怖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往来,或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外国势力有联系,其中包括萨勒曼·奥达、阿瓦德·卡尔尼等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宗教学者。萨法尔·哈瓦里和纳赛尔·欧迈尔也在2018年相继被捕,前者是因谴责沙特王室与以色列的联系,^②后者则是因为发布了批评王室改革政策的推文。^③在高压政策下,以阿伊德·卡尔尼和穆罕默德·阿里菲为代表的一些民间宗教学者转变了立场,成为王储的积极支持者。其中,阿伊德·卡尔尼在2019年曾在电视节目中对“觉醒运动所发布的极端教法意见”公开道歉,并因此招致其他仍处政治不同意见立场的宗教学者的谴责。^④

在宗教领域的制度和职能改革中,最受关注的是劝善戒恶委员会职能的变化。阿卜杜拉国王时期,就曾限制过劝善戒恶委员会的权力。2006年因宗教警察的权力滥用,沙特内政部颁布法令要求宗教警察在逮捕嫌犯后需要将其移交于公诉机关,而不能私自关押或参与后续调查。^⑤萨勒曼国王执政后,劝善戒恶委员会的职能被进一步缩减。2016年,沙特内阁针对劝善戒恶委员会出台了新的法规,规定若宗教警察发现存在违反教法的行为,不能直接逮捕嫌犯,而需要先向政府警察上报。如此一来,宗教警察基本不再具有实质性的权力。自2017年开始,宗教警察基本从沙特的公共生活中消失,而劝善戒恶委员会的职能也从

① “Council of Senior Scholars: Muslim Brothers’ Group Don’t Represent Method of Islam, rather only Follows its Partisan Objectives, Violating our Graceful Religion,” <https://www.spa.gov.sa/viewfullstory.php?lang=en&newsid=2155594>.

② “Prominent Saudi Scholar Ahmed Al-Amari Dies in Prison,”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1/21/prominent-saudi-scholar-ahmed-al-amari-dies-in-prison-activists>.

③ “Taqrīr ‘an i’tiqāl rajul al-dīn al-muhāfaz nāsir al-umar fī al-su’ūdiyyah,” <https://www.bbc.com/arabic/middleeast-45161308>.

④ Raihan Ismail, “How is MBS’s Consolidation of Power Affecting Saudi Clerics in the Oppositio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19/06/04/how-is-mohammads-consolidation-power-affecting-oppositionAl-saudi-clerics/>.

⑤ “Feared Saudi Religious Police Reined in,” <https://www.wrn.org/articles/21666/>.

强制性地“戒恶”转变为温和地“劝善”。^①

重要变化同样发生在司法领域。长期以来,沙特的司法机构由瓦哈比派宗教学者所主导。尽管随着第三沙特王国建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司法系统逐渐发展和规范,但始终未能挑战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司法体系。在一些伊斯兰教法无明确规定的领域,如劳工、商业、金融等,则通常由皇家法令、皇家命令和部长理事会决议等国家法规来补充。而之所以称其为“法规”而非“法律”,则是为了避免与“伊斯兰教法”相提并论,从而僭越只属于安拉的“立法权”。也正是因此,伊斯兰教法的“法典化”在沙特一直是一个敏感且充满争议的问题。但随着萨勒曼父子改革进程的推进,原本对这一问题持坚决反对态度的保守声音被压下了,而一些原本由伊斯兰教法主导的司法领域正加速被各种形式的国家法规所取代。例如,原本属于劝善戒恶委员会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被2019年内政部出台的《公共礼仪法》取代。^②而2021年穆罕默德王储宣布拟定《个人身份法》《民事交易法》《酌情制裁刑法》《证据法》四项法律,事实上是对民法、刑法和诉讼法等主要法律体系的规范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伊斯兰法官的自由量裁权。^③同时,也有信息表明,在法官和其他司法职务的招聘中,将会对更多的毕业于世俗法律学校的学生敞开大门。^④

通过种种调整措施,与宗教领域相关的各个层面的权力都更加集中在以穆罕默德王储为核心的王室权威之下。这并不意味着穆罕默德王储不再将宗教视为可用的资源。事实上,伊斯兰教仍在沙特国内外扮演着维护王室统治和合法性的重要角色,只是其中相对保守的因素被边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于传统价值观与宗教动员影响国家政治和公共生活从而动摇王室权威的可能性,

① Yasmine Farouk and Nathan J. Brown, “Saudi Arabia’s Religious Reforms are Touching Nothing but Everything,” in Frederic Wehrey, ed., *Islamic Institutions in Arab States: Mapping the Dynamics of Control, Co-optation, and Content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21, pp. 19~20.

② “Wizārah al-dākhiliyah tasdir dawūbit tatbīq lā’ hah al-dhawq al-āmm,” <https://sabq.org/saudia/vb68ps>.

③ Marwa Rashad, “Saudi Arabia Announces New Judicial Reforms in a Move towards Codified Law,”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audi-judiciary-idUSKBN2A82E6>.

④ Yasmine Farouk and Nathan J. Brown, “Saudi Arabia’s Religious Reforms are Touching Nothing but Everything,” in Frederic Wehrey, ed., *Islamic Institutions in Arab States: Mapping the Dynamics of Control, Co-optation, and Content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21, p. 17.

而重构的“温和伊斯兰”话语开始发挥主要作用。

三、“国族主义”的话语构建

在调整国内政教关系的同时,近年来穆罕默德王储也开始倡导并倚重“国族主义”话语,以此来构建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①这种“国族主义”致力于塑造基于国家的民族认同,追寻共同的历史记忆,唤起民众对于祖国领土的热爱,从而与沙特过去对宗教传统的强调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比。

自 1932 年建国以来,沙特的国家建构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自建建国伊始至 20 世纪 60 年代,统治者的权力建立在部落政治之上,通过联姻等方式建立部落联盟来获取其对沙特家族效忠,国王对外征战、统一领土的宗旨则是为了恢复“纯净的伊斯兰信仰”,因此在文化上是以瓦哈比派价值观来规约司法、教育、礼俗等社会领域。20 世纪 60 年代起,为了对抗埃及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沙特开始大力推行泛伊斯兰主义,通过对外输出瓦哈比派教义,来确立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沙特不仅将瓦哈比派伊斯兰教作为国家内部的文化认同来源,更期望以此来整合整个伊斯兰世界。因此,在前两个阶段,瓦哈比派传统在多个层面凝聚着沙特社会的统一、秩序和共识,亦是政权合法性和社会文化认同的最主要来源。当前萨勒曼父子掌权时期对沙特国家认同的建构可被视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将原本源于宗教的国家、社会和文化认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行边缘化,并以基于王权和领土的历史记忆来塑造新的身份认同。

首先,沙特通过对建国历史和前伊斯兰传统的追溯,在历史文化观中突出“沙特民族”的存在感和连续性。这一点在教育领域体现尤为明显。沙特政府对中小学生的教材和课程进行了改革,新版教科书对前伊斯兰文明持积极态度,这与此前基于瓦哈比派的宗教立场呈现出极大反差。在传统的伊斯兰历史观中,伊斯兰教的创立才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开端,而此前的时期则被称为充满无知的

^① 牛新春《中东政治演进的特点》,《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2 期,第 3 页。

“蒙昧时期”。新教科书中,对欧拉古城的颂扬是美化前伊斯兰文明的一个重要环节。欧拉古城是前伊斯兰时期奈伯特文化的遗留,原本默默无闻,但因获得穆罕默德王储的极力推崇而声名大噪,沙特政府斥资150亿美元对其进行旅游开发,几年来吸引了数十万游客。穆罕默德王储对欧拉古城的推崇旨在唤起民众对国家领土的热爱和对历史传统的认同。对前伊斯兰文明的积极认可为沙特国家历史赋予了一种连续性——连接了前伊斯兰时期与伊斯兰教创立后的时代。^①在此叙事下,沙特的国家历史可以追溯至伊斯兰教创立前200年哈尼法部落(沙特家族所属部落)在叶麻麦地区定居的时期。^②这种连续性的叙事能够极大地延长沙特的国家历史进程,并塑造沙特家族在其中扮演的核心角色。

新的“国族主义”历史观强调的是基于领土和王权的民族认同,而非基于伊斯兰共同体的宗教认同。小学生的新教科书中删除了原本介绍瓦哈比派教义创始人穆罕默德·本·阿布杜·瓦哈卜生平和教义主张的相关内容,强调以表达民族自豪感和遵守法规法纪的方式来服从王权、忠于国家。^③沙特“建国日”的设立也同样体现了这一逻辑。在此前的国家历史叙事之中,沙特一直将1744年沙特家族创立者伊本·沙特与穆罕默德·本·阿布杜·瓦哈卜结盟的历史事件,视为沙特国家历史的开端。然而,2022年1月27日,萨勒曼国王颁布皇家命令,将2月22日定为沙特的“建国日”,并明确第一沙特王国的起始为1727年伊本·沙特在德拉伊叶建立统治的时间。这一举措一方面持续地降低瓦哈比主义的存在感;另一方面,申明了沙特家族的王权统治在“建国神话”和统治合法性中的首要位置。

为了更好地唤起民众尤其是国内年轻人对国家的热爱、自豪以及对王权的忠诚,以王权为核心的政治精英不仅解除宗教机构对社会文化的垄断性解读和控制,还需要倡导一种更加世俗化、开放化和年轻化的文化氛围。根据官方统

① Eman Alhusein, “New Saudi Textbooks Put Nation First,” <https://agsiw.org/new-saudi-textbooks-put-nation-first/>.

② “Taqrīr/ Al-Dar’iyah mir’ ūh al-tārīkh al-basharī allatī ikhtazalat judrūnahū tārīkh al-dawlah al-su’ūdiyyah mundh akthar min thalūthah qurūn madat,” <https://www.spa.gov.sa/2324675>.

③ Sultan Alamer, “The Saudi ‘Founding Day’ and the Death of Wahhabism,” <https://agsiw.org/the-saudi-founding-day-and-the-death-of-wahhabism/>.

计,沙特目前是一个高度年轻化的国家,35 岁以下人口占总数的约 60%。^①穆罕默德王储将年轻一代视为其政治改革的关键力量,不断强调年轻人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赢得年轻人的支持,穆罕默德王储承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设立多个官方机构推进娱乐、艺术、体育等行业的发展,来满足年轻人的喜好和需求。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将年轻人有效地凝聚在国家和王权的周围,避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在国际舞台上的“民族尊严”同样也是沙特构建“国族主义”的核心观念之一,并体现在其近年来总体对外立场以及具体的外交政策之中。“耻辱”与“压迫”是尊严的对立面,树立一个历史或现实中的外来压迫者或干预者形象,往往能够激发自身群体追求“解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在沙特新版历史教科书中,奥斯曼土耳其就被打上了这种“压迫者”的标签。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半岛的统治被视为“占领”,并对沙特王国犯下种种“罪行”,包括将阿拉伯半岛推入分裂割据的灾难之中。^②沙特官方的这一叙事一方面是为增强国民的民族历史归属感,另一方面也是为在紧张的沙特-土耳其关系背景下能有效激起民众强烈的反土耳其情绪。^③2018 年卡舒吉案后土耳其调查机构对沙特王储的一系列指控导致沙土关系急剧恶化,沙特不仅在媒体宣传中大量渲染反土耳其言论,而且在社会经济层面鼓励针对土耳其商品的非官方抵制行动,使得 2019 年至 2021 年土耳其对沙特的出口贸易额和贸易商品种类显著下降。^④

在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民族的真实性和连续性、尊严、天命和热爱等核心观念,能够使民族“自治、统一和认同的理想”得以与“实用的文化和政治计划联系起来”。^⑤也正是因此,外部事件的作用和内部群体及权力的重新组合

① “Population Estimates in the Midyear of 2021,” <https://www.stats.gov.sa/en/43>.

② “Saudi Arabia Changes Ottoman ‘Empire’ to ‘Occupation’ in School Textbooks,”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90829-saudi-arabia-changes-ottoman-empire-to-occupation-in-school-textbooks/>.

③ Muhammed Nafih Wafy, “Why Saudi Arabia’s Revisionist Erasure of Its Ottoman History will Backfire,” <https://www.newarab.com/opinion/saudi-arabias-erasure-its-ottoman-history-will-backfire>.

④ 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Saudi Reasons for a Rapprochement with Turkey,” <https://arabcenterdc.org/resource/saudi-reasons-for-a-rapprochement-with-turkey/>.

⑤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1 页。

会带来对集体传统的新理解和民族认同理想的变化。萨勒曼父子对“国族”观念的建构也是为了满足新的历史条件和政治需要。相比于对宗教传统的追溯,强调对国家的热爱和国家的利益,无疑更具有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意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破除守旧势力对政治经济改革的阻碍。

四、对沙特外交及域内外国际关系的影响

自2015年萨勒曼国王上台后,沙特的外交政策经历了“温和—激进—温和”演变。近年来,随着中东地区总体上人心思定,加之萨勒曼父子地位日趋稳固,进攻性的外交政策已经越来越不符合政治需要,萨勒曼父子更需要解决民生需求、维持国内稳定,以进一步夯实穆罕默德王储的继位根基。^①在平衡与各方关系、稳定地区局势的总体目标下,“温和伊斯兰”和“国族主义”话语其实也为沙特转向相对温和与更加柔韧的对外政策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作为国内“国族主义”和世俗化改革的外延,沙特开始奉行“沙特优先”的外交立场。一方面,“国族主义”相较于以往更强调本国利益,而非一味囿于“阿拉伯和伊斯兰共同事业”。^②因此,在处理诸如巴以问题时,沙特政府不再完全排斥与以色列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一些持国族主义立场的沙特人士甚至开始将“解放”巴勒斯坦的任务视为巴勒斯坦人的内部事务。^③另一方面,在应对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时,沙特倾向于采取更具针对性的行为以彰显其自主独立的形象。2018年8月,加拿大外交部在推特上批评了沙特政府逮捕社会活动者和女权活动者的行为,造成沙特与加拿大的关系恶化。作为回应,沙特驱逐了加拿大驻沙大使,并谴责加拿大“公然干涉别国内政”。^④2022年10月初,沙特主导下的欧佩克组织宣布将大幅削减石油产量,这一决定被西方批评为完全不顾及与俄罗斯

① 王霆懿、陈琪《沙特王室政治与对外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9期,第48页。

② 丁隆《萨勒曼继任以来沙特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前景》,《当代世界》2020年第2期,第18页。

③ Madawi Al-Rasheed, *The Son King: Reform and Repression in Saudi Arab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164.

④ Jonathan Fenton-Harvey, “Nationalism: An Underpinning of Saudi Arabia’s Foreign Policy,” <https://inside-arabia.com/nationalism-an-underpinning-of-saudi-arabias-foreign-policy/>.

对抗的美西方联盟的集体利益,“实际上削弱了欧洲即将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力度。”^①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在随后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中回应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他对美方试图游说其投票反对减产的行为提出尖锐反驳“我一直听到你们问‘你是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但你们是否考虑过沙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②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沙特采取更加实用主义的态度以发展平衡的外交政策,既维持与西方的合作关系,又重视加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联系,并尝试根据自身利益和诉求构建发展多个多边合作机制,愈发成为大国竞争中特色鲜明的新型“中间地带”里的一员。^③随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俄罗斯借叙利亚内战的契机重回中东,因此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有利于维护沙特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领导地位。2017年10月,萨勒曼国王出访俄罗斯,开创了沙特国王访问俄罗斯的先河,标志着沙特对俄罗斯定位的调整和沙俄关系的升温。^④在能源方面,沙特与俄罗斯联合共同调控国际油价,对抗美国争夺国际油价话语权的企图。在地区局势方面,两国在叙利亚内战、也门战争等问题上展开协调。在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沙特也未跟随美国脚步孤立俄罗斯。2023年3月,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访问莫斯科时,表示要“在各个层面加强和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⑤

同时,沙特也越来越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在经贸方面,沙特是中国主要石油进口来源国,而中国是沙特最大的石油出口市场和贸易伙伴。沙特的“2030愿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双方在基础设施、新能源、信息通讯、航天科技等领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在政治方面,自2016年至今,中沙双方高层

① Kristin Smith Diwan, “Saudi Arabia’s New Nationalist Foreign Policy,” <https://agsiw.org/saudi-arabias-new-nationalist-foreign-policy/>.

② “Saudi Blasts Release of Oil Reserves ‘to Manipulate Markets’,”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21025-saudi-blasts-release-of-oil-reserves-to-manipulate-markets-1>.

③ 余纲正《新型“中间地带”:俄乌冲突中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58~76页。

④ 陈沫《沙特阿拉伯“新政”与中沙合作前景》,《当代世界》2019年第8期,第57页。

⑤ “Saudi Arabia Strives to Develop Relations with Russia at All Levels,” <https://www.zawya.com/en/world/middle-east/saudi-arabia-strives-to-develop-relations-with-russia-at-all-levels-knumq2xe>.

互访频繁,中国不干涉内政、以政治协商解决分歧和冲突的外交原则与沙特稳固王权、寻求地区局势稳定的意愿相一致。2023年3月,沙特与伊朗在中方斡旋下达成和解,为加速中东局势的和平稳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沙特媒体《阿拉伯新闻》就指出“沙中合作作为一个被战争、疾病和人为灾难所折磨的世界带来了巨大抚慰。”^①除了积极发展与世界大国的关系,沙特亦高度重视参与多边合作机制。2020年11月,沙特作为轮值主席国举办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此外,沙特还积极推动加入“金砖国家集团”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合作平台。

在地区层面,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竞争导致双方陷入结构性对抗,尤其在逊尼-什叶教派冲突话语的包装下,双方在地区焦点国家发动代理人战争,导致两国关系紧张逐渐升级,一度跌入冰点。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后,两国及其代理人之间的冲突更是绵延不断,海湾地区的矛盾对立也一度被视为中东地区继巴以冲突后又一个无解难题。不过随着双方连年冲突带来的边际收益下降,美国的战略收缩对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受到质疑,同时两国渴望解决国内社会发展问题的内部因素逐渐升高,双方和解与复交的意愿日益强烈。中国、沙特与伊朗三方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声明除了带来沙伊双边关系的缓和,也为也门和平进程打开了大门,更为促进海湾地区总体形势企稳向好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对于沙特来说,为了配合经济多元化的诉求、吸引外部投资,势必要营造一个包容、开放的社会环境。因此,沙特致力于打造“温和伊斯兰”的形象,不再“唯我独尊”,而是宣传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宗教、宗派的和谐共处。事实上,这一主张不仅为削减沙特国内的教派主义思维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且正好也与近年来伊朗方面提倡“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与纯正的伊斯兰教格格不入”的话语相契合。^②作为配合穆罕默德王储宣传“温和伊斯兰”话语的主要人物,伊盟秘书长穆罕默德·本·伊萨致力于以伊盟为代表的宗教组织,推动沙特温和形象在

^① Faisal Al-Shammeri, “Saudi Arabia’s Balanced Foreign Policy,” <https://www.arabnews.com/node/2216841/saudi-arabia’s-balanced-foreign-policy>.

^② 易卜拉欣·莱希《老朋友是未来合作的最好伙伴》,《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2版。

海内外的构建。2019年5月,在他的主导下,伊盟召开“经训中的中正温和价值观”会议,来自139个国家的1200多名伊斯兰教知名学者参加该会议,会议推出了“麦加宣言”,号召以文明的合作和对话来取代文明冲突论,弥合伊斯兰教中的教派分歧,消除极端主义的影响。^①2022年5月,伊盟举办了首届“宗教信徒共同价值观论坛”,广泛邀请来自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等多个宗教的宗教领袖参加。^②该论坛所提出的“共同价值”亦证明了沙特将促进各宗教的和谐共处作为“温和伊斯兰”话语的内涵之一。另一方面,沙特国内什叶派的生存环境也有所改善。由于穆罕默德王储对宗教领域的约束和管控,原本善于宣扬教派对立的“觉醒运动”宗教学者皆被捕入狱,教科书和电视媒体中反什叶派的言论被审查并被大量剔除,什叶派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权利,尽管被认为只是“象征性”的,如一名什叶派人士被任命为内阁成员,尼奥姆新城董事会包含一名出身什叶派的董事,黎巴嫩什叶派学者穆罕默德·侯赛尼被授予沙特公民身份等。^③种种举措都为削弱沙特与伊朗关系中的教派冲突因素提供了良好条件。

五、推进“温和伊斯兰”和“国族主义”的动力与制约

无论是对政教关系进行改革还是倡导“国族主义”的话语建构,都是萨勒曼父子特别是穆罕默德王储改革大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彻底改变权力分享式的家族政治,实现权力集中和巩固,打造出一个具有沙特特色的“一体多元”社会。同时,这些高调改革举措的背后还有更加多维和深入的考量。

在意识形态层面,沙特需要借助“温和伊斯兰”弱化政治伊斯兰的影响,并与“极端主义思想”划清界限。沙特视政治伊斯兰力量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因

① “Mu' tamar wathiqah makkah al-mukarramah,” <https://themwl.org/ar/conference-on-the-charter-of-makkah>.

② “Forum On Common Values Among Religious Followers,” <https://themwl.org/en/forum-on-common-values>.

③ “Shias Are Doing Better in Saudi Arabia,”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18/08/30/shias-are-doing-better-in-saudi-arabia> “Lebanese Shia Scholar among Those Granted Citizenship by Saudi Arabia,”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News/gulf/2021/11/15/Lebanese-Shia-scholar-among-those-granted-citizenship-by-Saudi-Arabia>.

素。“阿拉伯之春”后,沙特是继埃及之后第二个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的阿拉伯国家。尽管在沙特目前的教育和文化氛围中,瓦哈比派传统的影响已受到制约。但在对外表态中,穆罕默德王储从未公开对瓦哈比派教义予以否定,而是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归因于政治伊斯兰,尤其是沙特国内“觉醒运动”的影响。^①对政治伊斯兰的警惕与谴责源于对其“以教治国”核心主张的全盘否定。而“温和伊斯兰”是在不放弃传统伊斯兰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与政治伊斯兰形成对立的意识形态倾向,从而使沙特既能保留伊斯兰世界领导者、“两圣地仆人”的超然地位,又能与“极端主义”的污名划清界限。

在此基础上,“温和伊斯兰”改革是沙特营造更加积极正面的海外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推动经济多元化转型,吸引外国投资,沙特需要摆脱外界对其抱有的宗教保守的刻板印象,营造包容、开放的国家形象。为此,沙特政府付出了种种努力,如在2019年放宽了对女性的监护限制并为其提供就业选择,在2021年发起旨在改善外国工人生存条件的改革等。在宗教领域,以伊斯兰世界联盟为代表的宗教机构,成为推动“温和伊斯兰”话语在海外传播的核心力量。这种“温和伊斯兰”话语不再“独尊”伊斯兰教而否定其他的文化传统,而是宣传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宗教的和谐共处。

自2016年初沙特推出“2030愿景”以来,已历时将近7年,沙特社会发生了难以忽视的巨大改变。为了实现经济多元化,必须要开放国家,融入世界,吸引投资,协调各方利益。“温和伊斯兰”和“国族主义”话语的推动为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定下了思想基调。这一社会话语的重塑,一方面起到了约束宗教领域、压制极端和激进思想传播的作用,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政治伊斯兰的退潮和教派主义话语的降温,成为使沙特社会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也促进了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局势走向缓和与稳定。随着海湾各国开始以共同的利益取代曾经的分歧,以及沙特不断加大对文化领域的投入,沙特在旅游、娱乐、体育、妇女赋权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正在向世界展现一个现代、开放的国家形

^① “Riyād ta’ūd ilā al-islām al-wasafī,” <https://www.al-watan.com/article/103310/news>.

象,并逐渐形成新的“软实力”。

就长期来看,一种观点认为,伴随现代化改革的加速推进,沙特最终将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长久以来一直垄断沙特政治的部落和家族权力或将被新的制度安排所取代,而目前确有一些迹象有利于这一趋势的扎根和延续。譬如,司法改革使沙特的法律更加规范健全,并加速了司法机构和程序的现代化,这能有效促进政府的工作效率以及国家的法治进程。另外,经济多元化发展促进了新的精英阶层的萌生,他们有可能逐渐取代旧的精英阶层,成为国家的“次权力”,统治家族不再是唯一的决策中心。^①新精英阶层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为宗教改革派和忠于王权的宗教学者将取代原本处于保守一方的瓦哈比派宗教权威,但随着宗教对公共生活影响力的衰减,宗教精英将整体被边缘化,而在法律、文化产业和创业等领域兴起的精英阶层将掌握更大话语权。^②可以看到,以宗教活动来组织、动员青年力量的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影响力正逐渐衰减,取而代之的是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基金会的快速崛起,该组织为沙特和国际青年提供资金、创意和技术培训,以文化、科技和商业活动为途径在青年群体中获取影响力。

但与此同时,也有人对于沙特现代化进程的前景深感忧虑。首先,变革本身所采取的手段可能会为沙特社会带来新的问题。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改革措施中将面临的批判和阻碍,萨勒曼父子首先需要将具有宗教和政治异见力量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因此,在2017年至2019年沙特政府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中,被逮捕的不仅包括长期以来具有不同政见者的宗教职员,也包括女权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等各领域的社会活动人士。从“国族主义”叙事的角度来讲,任何对王储的内政外交政策提出批评或反对的人士,都可以被贴上“叛国”的标签。^③这就揭示出沙特“国族主义”话语建构中的一股潜在矛盾,即是否能将热爱国家和国王等同于对萨勒曼父子的完全认同与服从。“国族主义”的叙事被反对者指责为穆罕

① Eleonora Ardenmagni, “Not Only Royals: The Gulf’s Policy-makers in the 2020s,”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licazione/not-only-royals-gulfs-policy-makers-2020s-35238>.

② Kristin Smith Diwan, “New Religious Elites in Saudi Arabia: Replacement or Displacement?”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licazione/new-religious-elites-saudi-arabia-replacement-or-displacement-35246>.

③ Fatiha Dazi-Héni, “How MBS is Rethinking Saudi Nationalism,”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licazione/how-mbs-rethinking-saudi-nationalism-23083>.

默德王储排斥异己的新型政治工具,部分西方媒体和学界也就此对沙特“人权”状况进行批判和控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族主义”这一观念的推广。

同时,更悲观的声音认为目前的改革成果是与穆罕默德王储个人的政治生命相绑定,因此它很难比王储的掌权时间更为长久,甚至可能还会因为王储的心意转圜而随时停摆。旧的精英、尤其是宗教精英将会找寻时机东山再起。在政教关系变革方面,更多的变化似乎只是人事行政或者部门职能的调整,而并非是对瓦哈比派教义和瓦哈比派学者利益集团的挑战。^①将瓦哈比派教义搁置而不是重构,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温和伊斯兰”和“国族主义”话语面临挑战。比如在沙特什叶派的问题上,可以看到,沙特什叶派的生存环境近年来已经得以改善,保守派瓦哈比学者的边缘化使得什叶派面临更少的言论攻击,而“国族”意识的构建也为什叶派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参与带来可能性。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能否彻底摆脱过去瓦哈比派传统带来的影响,使什叶派成为“多元”中平等的“一元”仍将面临多重困难;而在地区层面,在也门、叙利亚、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等国家,教派冲突已经从“代理人战争”演化成了内源性冲突,即便因沙特与伊朗的和解而使教派主义话语降温,要消除教派政治的遗留影响仍非易事。

以史为鉴,削弱宗教学者和宗教建制的权力从而使其为国家的政治改革服务,就算对于沙特来说也并非史无前例。20世纪60至70年代,费萨尔国王采用了类似的策略,而历史也证明了这种政策的可逆性。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消除麦加清真寺劫持人质事件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对沙特社会的影响,沙特政府再次启用宗教话语作为维护思想安全的手段,大力资助各种宗教组织,从而为20世纪90年代初“觉醒运动”爆发的抗议活动埋下伏笔。尽管穆罕默德王储的改革雄心更甚于前人,但事实上也仍可以被视为沿用了历任国王对宗教建制的实用主义的政策。只不过,在前几任国王时期更多地表现为王权对多个政治力量(包括宗教精英)的平衡,而穆罕默德王储因其作为沙特王国重启“父死子继”权

^① Yasmine Farouk and Nathan J. Brown, “Saudi Arabia’s Religious Reforms are Touching Nothing but Everything,” in Frederic Wehrey, ed., *Islamic Institutions in Arab States: Mapping the Dynamics of Control, Co-optation, and Content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21, p. 31.

力继承模式的第一人,更需要集中的权力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因此在试图掌控宗教领域这一方面表现出了更为强大的意愿。同时,沙特王室已经充分了解政治伊斯兰所带来的威胁,很难再给予宗教领域高度的自由或容忍宗教干涉政治。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沙特王室已经逐渐加强对宗教领域的掌控,并收缩对跨国伊斯兰活动的支持。因此,此轮政教关系变革的目的并不是清除瓦哈比主义传统或瓦哈比派宗教学者,而是使其在不威胁王权的前提下,为新时期的王权政治所使用。一方面,瓦哈比主义在沙特已经维持了200余年,其教义思想和宗教资源已经渗透入沙特社会的各个层面,短时间内难以动摇;另一方面,沙特仍需要维护其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和“两圣地仆人”的地位,而这离不开来自宗教机构的支持。

因此,穆罕默德王储主导的政教关系变革和社会话语重构在当前为沙特对内和对外政策都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仍面临着多重挑战。首先,作为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社会话语重构,“温和伊斯兰”和“国族主义”如何能够更好地自圆其说、真正得到社会各阶层的一致认可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目前来看,穆罕默德王储的改革措施主要着眼于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年轻人,而对于在传统宗教氛围中成长的老一代人其所受到的价值观冲击究竟几何尚不得而知。基于这层考虑,萨勒曼父子并未因“保守派”宗教学者对现代化进程的抗拒和批判而采取强硬手段,反而多次在公众场合中表达对他们的尊重。在当下“收缩”的宗教领域,瓦哈比派教义也仍维持着主导地位。宗教教育中对于教义学的探讨仍遵循瓦哈比派传统,官方清真寺中的宗教职位也依然由瓦哈比派学者垄断。因此,这种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之间产生的张力将会在长期过程中产生怎样的结果目前还难以预判。其次,重构的社会话语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瓦哈比主义保守和排他性的特色,但其能否真正替代曾作为沙特最强大的“软实力”的瓦哈比派宗教价值观,以及将在多大程度上对海外穆斯林产生影响,仍是有待验证的问题。再次,如前文所述,目前的改革措施通常被视为与穆罕默德王储的政治生涯深度绑定。而若要长期维持改革成果,则必须要使当前的社会话语制度化,真正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但是,这一过程往往又会受到沙特的王室政治和

地区国家权力博弈的广泛制约。

六、结 语

长期以来,沙特阿拉伯奉瓦哈比派教义为国教,在政治领域和公共生活中践行着瓦哈比派传统和价值观。瓦哈比主义对内维护着沙特的社会行为规范,对外发挥着巨大的“软实力”作用,对海外穆斯林产生深刻影响。在沙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尽管王权与教权的分歧和博弈屡有反复,但随着王权对宗教领域的控制不断加强,基本形成了政主教从的格局。官方和民间宗教力量难以对王权产生直接的威胁,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萨勒曼父子掌权后,推出“2030 愿景”以实现经济多元化,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为推行这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战略既需要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又需要打造相对开放、多元和包容的社会氛围,从而与瓦哈比派保守、排他的教条难以兼容。因此,沙特推出了“温和伊斯兰”和“国族主义”的话语,为这种现代化和世俗化倾向的变革赋予法理支持。“温和伊斯兰”概念尝试消解传统的保守宗教理念在国家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并通过倡导各宗教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展现一种平等、多元的姿态;而“国族主义”则强调服从国王和王储、热爱祖国,以“国族”而非宗教为纽带,以此试图将沙特各方力量以王权为核心黏合为一体。不过,这些改革措施并未彻底否定瓦哈比主义,因此能多大程度上撼动传统宗教学者的根基及其社会影响力有待观察。长期来看,沙特特色的“一体多元”理念如何能够逻辑自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取代瓦哈比主义在政权合法性及社会凝聚力方面的作用,也仍然需要时间去验证。但毫无疑问,若要维持当前的改革成果,必然需要将这种社会话语的变革制度化,使其超越萨勒曼父子特别是穆罕默德王储的个人色彩,真正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

Keywords: Medi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mediation diplomacy; great power mediation; Middle East diplomacy; China's medi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uthor: Ma Xiaodong,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Ma Xiaodong

Area Studies

102 Game between Great Powers on the Principles of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Syrian Conflict

Abstract: State behavior is determined by national interests, but state behavior is also affected by international norms. This is the case with the actions of the participating forces in the Syrian conflict, which are driven by interests on the one hand and influenced by norms such as the principles of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on the other. Although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Syrian conflict believe that the principles of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are both important and should be observ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s well, they have shown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r the two normative principles in their interaction: the interfering parties have shown a preference of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take precedence over sovereignty principles"; anti-interventionists have shown a preference of "sovereignty principles take precedence over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In this way, the international normative question of "which is first,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or the principle of human rights" arises i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is kind of interactive behaviors mainly includes: the struggle over whether to implement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gainst Syria; the struggle over chemical weapons attacks in Syria; and the struggle over cross-borde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Syria. In international struggl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 country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normative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struggle to maintain the consistency of it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and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Keywords: Syrian conflict, international norms, sovereignty, human rights

Author: Yue Hanjing, Professor, School of Govern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Yue Hanjing

129 Political-Religious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Discourse in Saudi Arabia

Abstract: Saudi Arabia has long adopted Wahhabism as its dominant faith and practiced Wahhabi values in its political field and public life. After King Salman took power

• 156 •

er , he and the crown prince Muhammad bin Salman launched Vision 2030 to diversify the economy and address problems in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Vision required not only a more concentrated power but an open , pluralistic , and inclusive society that was at odds with the conservative and exclusive Wahhabi dogma. As a result , with Muhammad bin Salman as the driving force , Saudi Arabia began to promote political-religious reform from the top down , advocating moderate Islam and nationalistic discourse , while shelving and marginalizing Wahhabism. Moderate Islam advocate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ong religions , showing an egalitarian and pluralistic posture. Nationalistic discourse emphasizes obedience to the throne and patriotism to unite all forces in Saudi Arabia with nationality rather than religion as the bond. Through analyzing the specific measures of Saudi Arabia's political-religious reform , the connotation and motivation of moderate Islam and nationalistic discourse ,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although Saudi Arabia's new discourse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short term , the long-term continuation of these results may depend on whether it can transcend the personal charisma of MBS and truly become a part of the state system.

Keywords: moderate Islam , nationalism , religion and politics , Saudi Arabia

Authors: Sun Xiaowen , Research Fellow , Institute of Buddhist and Religious Theory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he Gangzheng , Assistant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Tsinghua University

Sun Xiaowen She Gangzheng